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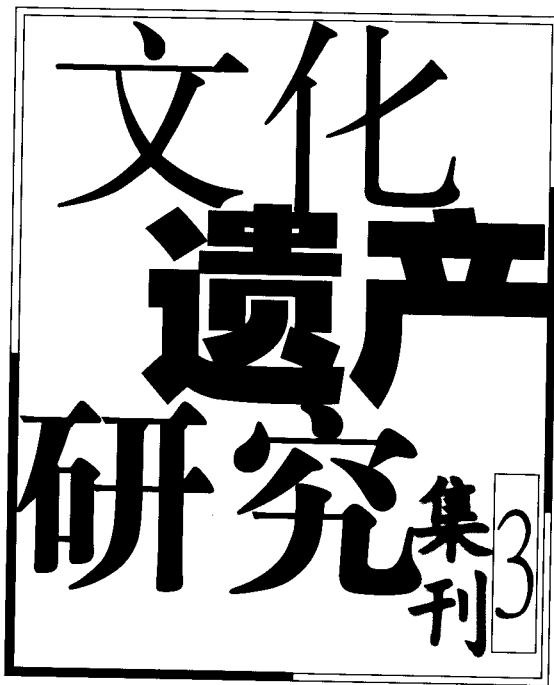
文化遗产研究

集刊 3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第三辑/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

ISBN 7-5325-3381-6

I. 文... II. ①复... ②复... III. ①博物馆学
—丛刊②考古学—丛刊 IV. ①G260-55②K8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1710号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第三辑）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X1156 1/32 印张14.5 插页5 字数350,000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381-6
K·463 定价：3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2505187

目 录

· 思想与方法 ·

西阴村发掘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	陈 淳 高书勤	1
“空方”不空：三峡考古作业分析.....	高蒙河	20
考古类型学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万州石地磅汉代 M2 初步研究	黄 颖	35
“世界遗产学”研究的对象与目的	蔡达峰	67
博物馆发展的新方向：功能、类型和管理	杨志刚	87
文物研究的借鉴与思考		
——读《艺术与历史》札记	刘朝晖	108

· “艺术史的视野”特稿 ·

附庸风雅与艺术欣赏	范景中	122
诗画合璧与明代士绅的社交方式	陈正宏	148
艺术制作、寺院储备与物资流动		
——敦煌佛教美术中的几个问题	[美]胡素馨	159

· 专题研究 ·

三峡地区汉代陶器初探	朱顺龙 褚 馨	167
重庆云阳地区古代聚落演变初论	潘碧华	189

斗彩、素三彩瓷器研究	周丽丽	207
论《快雪时晴帖》墨迹	穆 棣	243
先秦古文字嬗变发展研究例	朱顺龙	273
明代江浙地区的商品经济与藏品市场	沈振辉	282

· 观察与思考 ·

技术进步与观念创新

——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程与人文关怀	曹兵武	289
无法挽回的损失		
——论盗掘活动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破坏	陆建松	300
小型专题性博物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新亮点		
——论发展小型专题性博物馆的必要性		
及现实意义	杨 怡	312
浅谈浦江东岸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田永福	332
庐山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张武超	344
林风眠的位置		
——兼论中国绘画的传承与创新	赵 琳	357
将文化遗产教育尽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2001年高考上海语文卷一道作文题		
引出的思考	闻 泽	365

· 域外采英 ·

出口至东南亚的元青花的重要意义

..... [英]简·比米什 著 李仲谋 译	375	
江都的漆工“卢家”	[日]高桥隆博 著 汪 劲 译	405
历史博物馆与美国文化		

.....	[美] 菲丽丝·莱费 讲演 姚一青 译	423
· 资料与珍藏 ·		
1999 年度重庆万州麻柳沱遗址发掘简报	复旦大学考古队 431
回眸 2001 年	
——编后记	杨志刚 451

Contents

*** Theory and Method**

Excavation at the Xiyin village and the proces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Chen Chun and Gao Shuqin</i>
“Empty test square” is not empty: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in Sanxia	<i>Gao Menghe</i>
Practice and 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typology——A preliminary study of M2 burial at Shidibang, Wanzhou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i>Huang Ying</i>
Objective and purpose of the study of “global heritage”	<i>Cai Dafeng</i>
New orientation of museum development: function, form and management	<i>Yang Zhigang</i>
Lessons and implication of relics research	<i>Liu Zhaohui</i>

*** Perspective of Art History**

“Mingle with scholars and pose as a lover of culture” and appreciation of art	<i>Fan Jingzhong</i>
Combination of poem and painting and social outings of gentleme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Chen Zhenghong</i>
Art production, temple reserve and materials flow	

..... (America) *Sarah E. Fraser*

* Special Topics

- A study of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Sanxia region *Zhu Shunlong and Chu Xin*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ancient settlement change in the Yunyang region, Chongqing *Pan Bihua*
A study of porcelains of under-glaze blue and over-glaze enamel and enamel on discuit *Zhou Lili*
On the handwriting of 《Happy snow in shiny days》 *Mu Di*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Qin written language *Zhu Shunlong*
Market economy and collection market i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reg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hen Zhenhui*

* Survey and Consideration

- Technological advance and ideological change *Cao Bingwu*
Irrecoverable damage—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caused by looting *Lu Jiansong*
Small museums with unique topics: a new hot spot of museum enterprise in China *Yang Yi*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Pudong *Tian Yongfu*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Lushan Mountain *Zhang Wuchao*
The position of Lin Fengmian *Zhao Lin*
Put educ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	Wen Ze
 * Collection from abroad	
Significance of export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s to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England) Jane Beamish (trans) Li Chongmou
Painters of “Lu family” at Jiangdu (Japan) TAKAHASHI takahiro (trans) Wang Bo
Historic museum and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 Phyllis Leffler (trans) Yao Yiqing
 * Data and Treasure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Maliutuo site in Wanzhou, Chongqing in 1999 Archaeological Team of Fudan University
Retrospect of 2001——Commentary after edition Yang Zhigang

· 思想与方法 ·

西阴村发掘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

陈 淳 高书勤

张光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这件事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正是由于殷墟出土的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他假设，如果中国以自己主要的力量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遗址比如半坡、姜寨或庙底沟，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中国的考古学可能就会像西方那样注重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和石器的分析^①。中国考古学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路，一个主要以社会科学为取向的考古学独立分支就可能在中国诞生^②。

虽然殷墟在中国考古学定位的确立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服务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并在后来的近一个世纪里在传统史学和古器物学的圈子里打转，但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不是殷墟而是山西夏县西阴村。安特生在 1918 年已经造访过周口店，1921 年发掘了仰韶遗址，然而由中国学者

自己独立发掘的第一个遗址就是西阴村。由此可见，在1928年10月正式开始对殷墟开掘之前，中国考古学已经经历了大约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里，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主要还是针对史前遗址，其中还包括了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周口店龙骨山的中国猿人遗址的发掘。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跨出的第一步应当说还是踏在了史前学的定位上。后来中国考古学完全投入历史学的怀抱，应有其深刻的时代和传统的背景，而这完全不是李济个人所能左右的。

李济对西阴村和殷墟的发掘是历史落在他肩上的使命，这个使命来得突然而无准备。正如福尔肯霍森所言，在没有充分准备在中国从事考古的情况下，李济等学者必须调整自己的专业以符合本国的知识背景。由于充分意识到以史籍为基础的知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核心地位，把考古学放在历史学的探究之内在当时看来是惟一正确的选择^③。

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的起步和后续的发展不仅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而且深受这门学科开山祖师本身受训背景的影响。本文想对西阴村发掘的历史背景和李济在历史大潮下从体质人类学转向考古学的过程进行一番回顾，审视中国考古学独特的发展轨迹，并与西方考古学的同步发展轨迹作一比较，以便使我们能对这门学科的现状和努力方向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历史背景

西阴村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不是一件单独或偶然发生的事情，将其置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来审视，可以折射出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的学术定位和研究层次。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经学和史学是传统国学的核心，但

是这种情况在 16 和 17 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价值观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鸦片战争之后，西学的地位不断提高，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站在反对古文经学的角度上，认为包括《周礼》、《左传》、《诗经》等许多古书在内的绝大多数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而康有为更以振聋发聩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彻底地否定了经学，疑古思潮由此兴起。

这股疑古的思潮在五四期间愈演愈烈，在胡适为首的留洋学生们的推波助澜之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将疑古思潮推向了高潮。1926 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记载了自 20 年代初期以来逐步积累起来的主要成果，运用近代西方史学的思辨方法对中国的上古史作了无情的检讨，指出了古代典籍“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性质，动摇了整个伪古史的体系。李学勤指出：“由于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在 20 年代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④鉴于旧的偶像被打破，必须有一个新的体系取而代之，然而无论是疑古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的信史”来，于是中国学术界认识到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正如李玄伯所言：“若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地向发掘方面走。”^⑤

1925 年，清华学堂改为大学，同年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李济被聘为国学研究院的人类学特约讲师。王国维在国学院讲授中国古文字课，在讲义《古史新证》导论中提出了以纸上之材、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⑥。

如果说，疑古思潮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为

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为考古学提供了学术活动的舞台,那么,自然科学尤其是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发展对于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也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条件。

在西阴村发掘之前,已有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在中国境内从事地质古生物学及史前考古学的工作。比如,1918年,安特生考察了周口店,并于1921年由师丹斯基主持开掘;1920年开始,以安竹思(安德鲁斯)(H. Andrews)为首的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探险队在蒙古高原进行了近10年的考古工作;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河南仰韶村遗址,并提出了中国彩陶西来的假说;1925年,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河北泥河湾进行地质古生物学与考古学调查发掘。这些先驱性工作大大激发了李济等人的兴趣,他们决定多作细密的研究,寻求切实的证据,以了解新石器晚期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们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⑦。

在此有必要对李济的学术背景做一简介。李济早年在旧学上受过家庭的熏陶,辛亥革命前夕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在清华的8年里打下了英文和“新学”的基础^⑧。1918年李济官费留学美国,先在麻省的克拉克大学学了两年心理学,其后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转到了哈佛大学改读人类学^⑨。1920年前后,李济曾经写了一份很短的自传,讲述他求学的经过与志愿,其中最后一段讲述了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去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⑩李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年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教授人类学。

如果没有西阴村的发掘,李济可能仍然执著于测量中国人的脑袋和寻绎中国人的原始,而不会去探究中国文明的历史。尽管

考古学在美国属于人类学的分支,但是李济并不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意义上的考古学家,他专攻的方向是体质人类学,如果说与考古学相关,也许仅是与史前考古学相关的古人类学。

二、目的与方法

西阴村的发掘工作并非无源之水。寻根溯源,是多种历史因素风云际会的产物。由于西阴村发掘是第一项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工作,使得这次发掘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山之举和田野发掘研究工作的一座里程碑,并使李济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1924年,对中国文物颇感兴趣的美国佛利尔艺术陈列馆驻北京专员毕晓普(CW.Bishop)建议李济做一点野外工作^⑪,这一建议得到了清华校长曹云祥的首肯,表示同意以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合作的名义进行。后来,李济又与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磋商,丁文江也欣然赞同,并要求双方单位出面签订协议^⑫。1925年李济受聘回清华任教。当时在清华国学院任职的梁启超也十分热心田野工作,主动将李济推荐给山西省省长阎锡山。当时两位前国务总理也十分支持这项工作,亲自为李济谒见阎锡山写了推荐信。

选择山西省既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的考虑,也是李济自己的研究思路方面的要求。山西的治安管理在当时十分动荡的中国相对比较稳定,便于进行野外工作。李济后来坦言:“选择山西为工作对象的动机,是《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山西。”^⑬这表明李济在开始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已鲜明定格在史学范畴之内,在学术定位上将考古学田野工作和古史研究

紧紧结合在一起^⑭。

对史前考古深感兴趣，并曾与安特生在甘肃考察了两年的地质学家袁复礼与李济结伴同行，1925年2月9日离开太原后沿汾河流域南行进行调查。途中李济调查和测量了介休城居民的体质特征，造访了附近的一些古迹，然后来到了引起李济遐想的尧帝古都——临汾。在临汾西部的姑射山，他们探察了5处石灰岩洞穴，希望能找到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可是一无所获。于是，在和袁复礼进行了长时间磋商之后，李济确定了“部分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自己的调查方针。

3月4日，李济一行到达了浮山县，在一个黄土坡上采集到第一块红陶片。次日，他们沿响水河前行，终于在交头河一处黄土堆积上发现了大量彩陶片。这一发现使李济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在山西南部找到的第一处仰韶遗址。之后，李济继续前进，穿翼城，访绛县，歌曲沃，于17日抵达运城，并拜谒了舜帝陵。

3月20日，李济一行到达安邑县，县长陈先生是一位文物收藏家，他把散落在安邑各地的佛教造像和古碑收藏在衙门，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李济对陈县长的作为大加赞赏，认为他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并给人以一线希望——中国内地的古迹是有可能保护好的。22日，李济到达夏县——传说中夏朝的王都。在他们穿过西阴村的灰土岭时，突然发现一大片出露陶片的遗址，占地好几亩，要比交头河发现的遗址面积大得多^⑮。

1926年返京后，清华与佛利尔艺术陈列馆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由清华大学主持发掘，佛利尔艺术陈列馆提供资金，发掘权、采集权、保管权和论文发表权均归中方所有，只向艺术陈列馆提供报告的英文本。此次发掘开创了中外合作考古之先河。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田野考古工作比较陌生，发掘项目都需要外国机构提供资助。协议维护中国主权的立场，为以后中外考古合作提

供了很好的榜样。这一立场在 1927 年地质调查所长翁文灏与协和医院步达生签订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合作研究协议时,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⑩。中外科学机构在西阴村和周口店合作发掘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充分协商和谅解精神,以及中方代表既保证计划的实现又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堪称国际科学协作的典范。

最终发掘的地点为何选在西阴村,李济自述了三点主要的理由^⑪:

第一,此地点出土大量的陶片,是他和袁复礼山西之行中发现的最大一处史前遗址。李济与袁复礼所受的是西方自然学科的训练,他们从事考古发掘时的价值取向显然与传统金石学有所不同。在金石学家眼中,陶器毫无价值,而在现代考古学视野中,陶器则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最具时代与文化特征的考古遗存。

第二,挖掘史前不知名的墓葬可以排除挖宝的嫌疑。中国的宗法制度经过千年的发展巩固,力量极为强大。然而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恰恰是古墓与遗址,一旦挖了“祖坟”,会被视为破坏风水的大逆不道之举;因而选择不知名的遗址或墓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对安特生提出的彩陶文化西来说存疑,想以实物来加以检验。

但是看来最关键的原因,应当如李济在西阴村的报告中所坦言,选择夏县西阴村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传说中的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⑫。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结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

西阴村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记录在李济所撰写的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之中,虽然内容比较单薄,但其建构的框架与模